德国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与展望

王晓路

（北京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海外中共学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不断蓬勃发展。作为西方大国代表之一的德国对中共百年党史研究的成果，对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真实、客观讲好中国故事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对德国学术界中共党史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整合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德国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议题、研究特点和研究趋势，剖析德国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认识、思考国内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视角，获取有益的经验方法予以借鉴。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国际舆论环境和应对国际交流的风险挑战，掌握历史话语权，让国外能够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

关键词：中共党史；海外中共学；德国历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3-0032-07

收稿日期：2025-03-09

作者简介：王晓路（1995-），女，山东烟台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3.015

德国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祖国，是一个较早出现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思想十分活跃的国家，恩格斯在 1891 年 10 月出版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德国的社会主义在 1848 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德国共产党① 早在 1918 年就宣告成立，对第三国际的创建起了极大作用，中共中央早期德国军事顾问李德，就是第三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情报员。因此，德国学术界对海外共产党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研究起步较早，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研究才真正开始系统化，且较多集中于民主德国（东德）。而联邦德国（西德）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起步稍晚，大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才开始涉足，且多从意识形态批判方面进行研究叙述。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东西两德合并，两支中共党史研究队伍得到整合，产生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虽然与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研究成果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海外中共学研究领域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步入 21 世纪，德国对中共党史的关注、跟进和研究不断深入，从某种层面讲，这既反映出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也从侧面体现出海外各国对中国共产党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习近平主席强调：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②。因此，需要辩证看待德国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借鉴其有益视角和科学方法，对其局限性和错误偏见进行批判和澄清，积极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促进国际社会更加客观地、真实地认识中国共产党。

一、德国海外中共学研究主体

随着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德两国关系不断进步，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成为德国政商界和学术界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随着 72/144 小时

①德国共产党（德语：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 KPD，并非 1968 年成立的德国的共产党 Deutsche Kommunistische Partei，缩写 DKP）1918 年 12 月 30 日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的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团与不来梅左派合并成立。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316 页。

过境免签政策的出台，更多德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有机会来到中国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2013年以来，他们的研究方法、研究论题、学术观点大力推陈出新，跨学科、跨国界的合作研究成果斐然，研究机构、研究人才、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总体而言，目前德国学术界海外中共学研究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现实需求，特别是德方各界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深入了解的需要，使得德国有多方面的资金，注入对包括中共党史在内的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中。目前，德国很多大学扩充或者新增了汉学专业，增加了很多关于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海外中共学研究的课程和内容，很多政府组织、商会协会、基金会等也大量斥资建立智库，聘请很多德国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资料检索、信息收集、筛选分析、决策咨询等科研工作。

高校方面，德国从事汉学研究的高校或者具有汉学研究传统的高校较多，例如，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汉堡大学（Universität Hamburg）、慕尼黑大学（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莱比锡大学（Universität Leipzig）、海德堡大学（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弗莱堡大学（Universität Freiburg）、波恩大学（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等，进入21世纪以来，上述大学在原有汉学研究的规模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研究规模，增设了包括海外中共学在内的近代中国研究的讲席[①]，德国大学中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整体规模不断扩大，例如柏林自由大学中国研究所（Institut für China-Studien）在2010年后，增加了由著名汉学家余凯思（Klaus Mühlhahn）和顾安达（Andreas Guder）教授主持的两个讲席。弗莱堡大学社会学教授史明（Nicola Spakowski）牵头，联合史大年（Daniel Leese）教授，在该校汉学系设立两个讲席，专门对中共党史和现实政策进行研究，同时该系还有一个青年教授[②]莉娜·亨宁森（Lena Henningsen）参与该系研究工作。2012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德国大学，把现有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队伍独立出来，成立单独的汉学系或相关研究机构（绝大多数命名为“中国研究所”或“中国中心”），对包括中共党史在内的海外中共学内容进行研究。截至目前，海德堡大学的研究规模最大，其汉学系拥有独立的6个讲席，其次是刚才提到的弗莱堡大学拥有5个讲席，其他德国知名大学如维尔兹堡大学（Universität Würzburg）、图宾根大学（Eberhard-Karls-Universitaet Tuebingen）、科隆大学（Universität zu Köln）拥有3个讲席，法兰克福大学（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特里尔大学（Universität Trier）拥有2个讲席，基尔大学（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 zu Kiel）、不来梅应用科技大学（Universität Bremen）也有1个独立讲席。其他大学的社会学、经济学系，也有独立进行汉学研究的学者。德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经理周刊》记者沃尔夫冈·希恩（Wolfgang Hirn）曾于2021年统计过，目前，德国共有26所高等院校，开设了汉学学位课程。这足以说明，德国高校的汉学和海外中共学研究兼具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为对研究感兴趣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空间。

研究机构及智库方面，随着德国各界有着对中国进行深入了解的迫切现实需要，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及智库开始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学术研究，其中，研究成果丰硕、学界认可度高、社会知名度高的有：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Global and Area Studies，GIGA）、德国发展研究所（Deutsches Institut für Entwicklungspolitik，DIE）、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

---

①讲席（Lehrstuhl）：或译作教席，德国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发源地，广泛实行“讲席制”，大学根据自身研究方向的实际需求来设置讲席，类似于国内高校的专业申报和课程开设，目前大部分德国高校的讲席是以特定研究方向命名的研究所，一般来说，每一个研究方向设置一个讲席，一所高校内的讲席数量和级别相对固定。想在一所高校内开设一个讲席，一方面学术实力必须足够强大扎实，另一方面研究特色需要独特鲜明。

②青年教授（Junior Professur）：德国设立“青年教授制”，目的是提拔博士毕业成绩优异的年轻科学家，使他们尽早熟悉大学的教学工作。

tik，SWP）、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MERICS）等[①]。上述研究机构和智库中，最为出名的是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所。这家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研究机构，由德国外交部、汉堡科学和研究部以及多个德国州财政共同资助，2022年年度预算超过1300万欧元，其下辖的全球与区域研究院亚洲研究所（The GIGA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最多，并且该研究所与我国的外交学院建立了跨国合作关系，其2009年创刊的《当代中国事务》，专门用于刊载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包含多篇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论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成立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创始总裁德国特里尔大学政治系教授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鼓励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跳出传统的制度分析框架和意识形态争议，对当代中国进行更加中立且深入的研究，不断促进中欧之间对话交流，[②] 目前该研究所已成为欧洲最大的研究当代中国的智库。

二、德国中共党史重点研究对象及代表成果

与我国学术界对百年中共党史的研究类似，德国学界也将中共党史清楚地分成了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第一个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弗莱堡大学的史明教授在《勇往直前：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中的军事参与（1925—1949）》一书中，通过大量搜集当时中共的工作报告、报纸期刊、政府公文和领导同志回忆录，以中国女性参与中国革命这一独特视角，提出了当时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女性）对中国革命的阶级认同和民族认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二个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这一时期弗莱堡大学的史大年教授，认真梳理了中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十年“文革”动乱结束期间，社会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表象，他以非常翔实的历史图片和文字资料，全面描绘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状态。同时，史大年教授对这一历史时期给出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身处那个历史时代的中国人，特别是经历了中国近代以来磨难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建设国家有一种“痴迷”的信仰，会把建设国家当作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和目标。科隆大学的文浩（Felix Wemheuer）教授，曾于2000—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在他2019年出版的《冲突与变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史（1949—1976）》中，采用多层次视角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力图在评价成就与揭示问题之间保持理性的平衡。其历史社会学视角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社会成员的身份差别，他从微观历史学视角，通过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地方干部和少数民族等群体的分析，揭示了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身份的人，所展开的社会建设与改革的种种努力以及所遭遇的挫折，揭示了这一历史发展时期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提醒人们在艰苦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永远不应忘却“为了美好明天奋斗”的初心和所有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经历的严重挫折和应当汲取的深刻教训。

相较于前两个时期，第三个时期，也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德国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更为深入，显示出这一时期的中共党史对德国学术界有着更大的吸引力。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调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世界又经历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两大20世纪政治事件，诸多西方学者和观察家，都预言中国会“崩溃”或“解体”。然而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得到了高速发展，国际影响力空前提升，这自然引发了包括德国学者在内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这一时期，德国学者开始从政策演进方式、领导结构调整、意识形态变化、党群关系等角度，开始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成果也较为丰富，例如，杜伊斯堡—埃森大学（Universit ät of Duisburg-Essen）的资深教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用近30年时间，踏遍中国几乎所有省份，他从微观视角切入，例如，针对中国的基层社区，他撰写了《中国的社会

①蔡志鹏：《回顾与前瞻：新世纪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德国》，《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②Sebastian Heilmann（Hrsg），*Das politische System der Volksrepublik China*，Wiesbaden：Springer VS，2016.

政治参与—以社区为例》《西方公民社会观适合中国吗》《城市选举带来制度变化和合法性》《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和《城乡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对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阐述，并通过比较研究法，在中国国情背景下，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模式的形成原因和中国全过程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根本区别。在经济领域，他对中国广大的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进行了访谈调研，撰写了《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与民族认同》《处于市场行为—社会道德和民族责任感之间的民族企业家》等研究报告性质的论文，讲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特别是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后，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情况，对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政治层面，他也是立足基层，撰写了《作为战略性群体的县乡干部》《政府绩效考核—地方干部行为与地方发展》《作为战略性群体的县乡干部》等论文，通过对比中德两国在基层政府职能和治理方式的差别，探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措施落实落地的实现方式与现存问题。海贝勒教授的系列研究，在中德两国学界认可度非常高，中央电视台也多次对其进行专访，新华社、人民网等主流媒体也多次刊载其核心论点。前文所述特里尔大学韩博天教授所著《红天鹅—中国非常规决策过程》，向西方学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同苏联模式有着根本区别，指出中国共产党非常善于灵活地调整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而不是苏联守着斯大林模式不敢于变通，而且正是这种优势，使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21世纪初的奋斗目标①。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教授安晓波（Björn Alpermann）使用定量分析工具，对中国的经济变革、城市化进程、贫富差距、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进行了数理分析，其代表作《中国棉纺织业：经济转型与国家能力》就是运用大量经济数据，从单一产业视角，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做好宏观经济调控工作的。法兰克福大学国际政治传播学者福克·哈蒂格（Falk Hartig），则从大众传媒角度，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文化认同角度进行了分析，他的代表作《今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改革党（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Chinas heute：Von der Revolutions zur Reformpartei）》，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变化，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表现的应变与创新能力，并且指出中国共产党这些出色的表现，会让其将来能够不断适应更新更复杂的挑战。

第四个时期，即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时期德国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从历史转为当下，他们始终关心着最新动态，例如：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等。这期间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系何必（Heike Holbig）教授与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诺瑟特（Nele Noesselt）教授，就是从中国的儒家文化和民族认同出发，讲述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社会理想和国家认同的一致性，从内在机理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到14亿中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再就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热点关键词，通过CiteSpace语素分析后，发现德国学术界主要研究了三大关键词。一是“一带一路”倡议，其中讲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影响力再次提升，中国和欧盟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气候领域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成为双方合作的焦点。二是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德国之声》专栏评论呼吁学习中国抗疫的“速度与效率”，例如快速检测（4—7小时出结果）、方舱医院隔离轻症患者、数据共享追踪传播链等，认为这些措施是“唯一被证明有效的方法”。前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Rudolf Albert Scharping），则联名发文呼吁西方支持中国抗疫，指出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已经大幅提升，国际合作是维护共同利益的最佳方式，更是大势所趋。三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以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最为系统化和专业化，在二十大召开前后，连续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分析研判中共二十大对中国和世界的深远意义。德国学者对二十大报告中出现的“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多次提及的“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键词，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权威细致的解读。

---

①Sebastian Heilmann，*Red Swan：How Unorthodox Policy-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Hong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18.

三、德国中共党史研究特点及未来趋势展望

纵观中共党史在德研究历程，德国学界的研究明显有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传统西方国家，并且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呈现出了很多新趋势，涌现出了很多新成果，这些特点非常值得我们国内的学者去借鉴与参考。

（一）研究主要特点

德国学界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有两大突出性特点，这和德国学术界的传统研究模式息息相关。一是非常注重信息技术和网络新媒体的运用。其研究资料的数字化程度非常高，例如，中共的官方政策文稿（包含中央、省及地方性文件）、访谈记录、影视频资料，等等，而且数字的公开化做得非常好，例如，毛泽东时代遗产（Maoist Legacy）、科隆大学中国研究在线（Kölner China-Studien Online）、科隆东亚研究所、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等数据库都是向广大学者免费开放使用的。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很多德国学者同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更多地通过互联网在线上展开，毫不夸张地说，当今德国学术界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已经不可能脱离互联网这一平台。二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模式。从前文所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德国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从不拘泥于历史或者政治领域，都是通过经济、产业、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共同展开，很多工科见长的高校，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中共党史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们非常擅长进行跨文化角度的对比分析，例如：他们在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国民社会文化的变迁时，经常用 1990 年东西德合并时期的德国文化史做类比分析；他们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时，经常对同时期欧洲与中国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领域的重大事件进行深入剖析，这些跨文化、跨视角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具有非常明显的借鉴意义。

（二）研究发展趋势

德国近年来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也有了较大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德国学术界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发生了很多质变，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组织化、国际化程度空前提升，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得更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研究兴趣骤升。这一时期很多新的研究机构，特别是跨国研究机构或者研究组织诞生，如：德国中国学学会（Deutsche Vereinigung fur Chinastudien）、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组（Arbeitskreise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Chinaforschung）、欧洲中国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等组织，不断推动着包括德国学界在内的跨国界学术交流合作。并且很多德国研究成果以英语进行发布，更提升了研究成果的共享度。二是意识形态观念的弱化。西方长久以来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带有先天性偏见，冷战结束后，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站在反西方的立场上，因此很多研究成果带着“有色眼镜”。但是，德国学术界却主动跳出这一固执的偏见，强调要从客观事实角度，对中共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如：韩博天与海贝勒教授均提倡“不应预设任何意识形态立场的实证研究，用事实和依据对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和政策进行客观展示。”[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迅速腾飞和西欧的逐步衰落形成了鲜明的现实对比，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真正从学术研究而非政治攻击角度研究中共党史，来分析研判中国发展现状和前景。三是研究重点开始转向中共当代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随着中国不断打破“崩溃论”“解体论”，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德国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不再是“回头看”而是转变为了“向前看”，分析中共的政党建设、国家治理等成就，探讨中共未来的政策走向，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后，德国学界更加紧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最新进展，探讨新政策对国内及国际的影响。

（三）研究未来展望

党的二十大以来，特别是结合德国总理朔尔茨近期访华的重点合作领域和中欧合作对抗的背景，中德

①江树革、安晓波：《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当代转型和未来发展趋向》，《国外社会科学》2012 年第 2 期。

和中欧在经贸、环保、疫情防控、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合作会进一步深入，未来德国学界对中共党史及中共学的研究热度只会提升不会减少，因此我们可以对德国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如下三点合理性展望。第一，各方必会继续加大对中共党史领域研究的投入力度。德国联邦政府在当前大背景下，将中国视作系统性竞争对手（China ist systemischer Gegner），德国从政府到民间，都会加大对中国和中共研究的投入力度，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BMBF）在2017—2024年，追加了2400万欧元的投入用于支持德国大学中与中国有关的研究课题与项目，德国学界参与对华研究的人数也逐年攀升，未来德国学界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肯定会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第二，越来越多的研究工具会应用于中共党史研究中。新冠疫情前，德国对华研究特别是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主要使用实证分析、实地访谈、文献综述等方式进行，量化统计、数据建模等工具使用也颇为成熟，但随着新冠疫情3年对实地访谈的限制，以及德国学界对华数据库的不断完善，相信新的跨学科研究模型，在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中，会更为广泛地应用，越来越多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新的概念和理论将予以呈现，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将随着研究工具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会逐步提高研究占比。第三，越来越多的中国特色语素会出现在研究成果中。研读德国学界的研究成果，我们也会发现，更多“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逐步出现在其学术话语中，例如：在研究中国地方民主选举中出现了“选贤举能”“德才兼备”等明显带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词汇也开始出现在研究成果中，相信这些新语素的出现，必然会让德国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更加客观精准。

四、德国中共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通过对德国中共党史研究情况的回顾与梳理，我们看到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德两国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增强，中共学在德国学术界受重视的程度和研究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德国学术界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热度还会持续升温。但是德国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也要一分为二地辩证看待，肯定其学术价值的同时，也要发现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只有理性地分析这些缺陷，才能更好地了解国际舆论环境，更好地面对国际交流的风险挑战，更好地掌握历史话语权，让国外能够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

（一）辩证认识德国中共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目前德国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与缺陷，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从客观层面讲，德国的一些研究成果，确实存在着一手资料整理收集不完整，文献解读由于双方语言文化差异，存在一定偏差，对于中国的政治学要素，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模型，坚持“西方中心论”，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偏差，他们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同国内的学者相比，还是具有一定差距的，这也影响了他们做实证研究的精度。从主观层面讲，他们的研究概念与研究理论，还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形态和思维脉络，同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出入。尽管他们强调要祛除意识形态立场的差距，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研究上的谬误，甚至还有个别西方财团资助的，出于非学术研究目的所谓“中共党史研究者”或“中国通”，对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问题指手画脚，以学术研究之名行诋毁中国共产党之实。因此，我们要特别辩证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因主观臆断和意识形态偏见而造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读，要树立斗争意识，做到有力的驳斥与回击。

（二）真正在中德学术交流中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目前，我们对待德国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引进来”做得比较出色，特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等，对德国系统性的学术成果进行了高质量的翻译与推介，很多学术交流活动也是如火如荼地举行。但是，仅仅靠“引进来”是不够的，我们要不断地走出去，发出中国好声音，讲出中国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特别要求党史研究工作者，“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

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①]。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强化对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动态跟踪、系统研究与科学研判，精准把握其前沿研究态势与核心研究方向，构建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话语风格，形成科学的研究范式和叙述体系，结合包括德国研究在内的海外中共学研究的优势和长处，利用海外中共党史研究者所搭建的信息平台，更好地讲好中国共产党历史，促进德国学界对中共党史乃至中国的研究，朝着更加客观、真实的方向前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一个全面准确的中国。

Review and Prospect of Germany'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NG Xiao-lu

(College of Germ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fluenc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udies have continued to flourish in many fields such as political science, history,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Western powers, Germany's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hundred year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elling the story of China truthfully and objectively. This article first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and integrat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s participation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alyzes the main topics,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the current German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thoughts in Germany'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one hand, research can better understand and reflect on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obtain useful experience and methods for reference.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better face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master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let foreign countries know a real CP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seas CCP studies; German historical research

[责任编辑　如初]

①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